

虚幻的 战后日本综合研究乐园

The Emptiness
of Japanese
Affluence

[澳] 加文·麦考马克 著

郭南燕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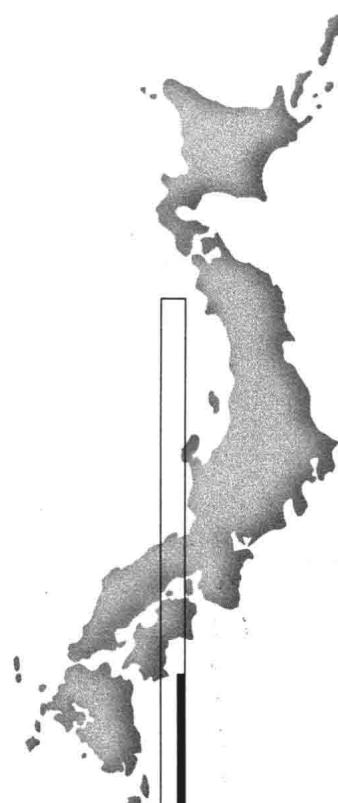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土木建筑国家
娱乐国家 农业国家
地域国家 和平国家
记忆与忘却

虚幻的 战后日本综合研究乐园

The Emptiness
of Japanese
Affluence

[澳] 加文·麦考马克 著
郭南燕 译



Gavan
McCormack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研究/(澳)麦考马克

(McCormack G.)著;郭南燕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书名原文: The Empitress of Japanese Affluence

ISBN 7-208-03201-7

I. 虚… II. ①麦… ②郭… III. 日本—研究 IV. D73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7972 号

虚幻的乐园

——战后日本综合研究

[澳]加文·麦考马克 著

郭南燕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5 字数 275000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3201-7/F · 637

定价 25.00 元

中文版序言

我很高兴地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拙著《虚幻的乐园》的中文版。本书于 1996 年首次在纽约和悉尼出版，又于 1998 年先后在东京和汉城出版了其日文版和韩文版。中文版译者郭南燕博士的热忱、效率及专业知识使得此书能同中国读者见面，我对她表示感谢。我欢迎读者们的意见和观点，请通过出版社或直接使用计算机网络与我联系 (gavan@coombs.anu.edu.au)。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此书所探讨的几个主题有着明显的意义。在本世纪末，日本处于毫无生机的局面。仅仅 20 年前，日本被称为“世界第一”。10 年前，日本所取得的大国的地位及经济上对美国的超越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自 1991 年起，泡沫破灭了。股票和地价的下跌使得国家的财富减少了至少 1000 万亿日元(有的推测是其 2 倍以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几乎没有增长，20 世纪末的目标是使负增长变为正增长，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数额。从对国家、公司和个人的财产的持续侵蚀中，出现了深沉而易于察觉的昏暗。这种昏暗又滋生了各种各样“世纪末”的社会现象，其中有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的化学毒气袭击、学校内的暴力活动、高中女学生的卖淫和无差别下毒事件等。

在日本国外，人们趋向于认为日本在衰退。1997—

1998.1.05

1998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被广泛地解释为“日本模式”的全面失败，其模式的内容是官僚主导的“国家开发”型资本主义和英美自由市场型资本主义。因害怕日本的不可阻挡的突飞猛进而产生的 80 年代的“攻击日本”的潮流让道于 90 年代的“忽略日本”或“无视日本”的倾向。曾经使人害怕甚至憎恶的日本现在却被看成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仿佛从中无法学到什么的国家。

最近的报告表明这种看法也在中国开始出现。日本被认为患了不可思议的疾病“日本病”，类似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病”，并进入了显然是难以逆转的衰落。^① 有种看法认为日本不再是第一流国家，中国同日本的关系不如中美和中俄的“战略性伙伴关系”那么重要。

如果中国人从近几年的日本挫折中只得到满足感，并且想取而代之，成为亚洲的经济强国的话，那是令人遗憾的。日本依然是世界主要的经济力量，其实力仍然像富士山那样耸立，在亚洲地区出类拔萃。国民生产总值在今后至少几十年中将继续远远超过中国、或印度、或整个亚洲地区。无论日本目前经历着怎样的艰难，其自现代化、工业化、高度增长、泡沫经济至萧条的道路及在现代化的起伏中为寻找和建立独特性和价值观而挣扎的轨迹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至少有一点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巨大发展的傲慢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下落和绝望的变迁过程表明了有必要更进一步地探讨构成“日本模式”的要素。什么是日本经验的有利和不利之处？我希望此书能够有助于分析和

^① 沈才彬，“日本モデルと決別した中国”，日本《中央公論》，一九九八年十月，九八一一〇八页。

理解这个问题。

日本是东亚的“成功篇章”，它被嵌入 20 世纪的矛盾的中心。在更广的亚洲背景中，此书的目的是思考其他国家为实现日本式繁荣而仓促效仿日本的程度如何，它们是否能预料一个相似的结果。当代世界的信条，特别是当代亚洲的信条恰好是“繁荣之道”，日本是此信条无与伦比的实践者。假如日本的结果是此书所述的那样虚幻和令人难以捉摸，那么有必要重新慎重考虑这个模式。

“繁荣”和“可持续性”也许是不相容的，这种认识使得当代信仰中的主要条目漏洞百出，从而被人厌恶。然而，我认为日本目前经济生活的基础是难以持续下去的，而且在任何其他地方也是无法再出现的。对于通向 21 世纪的日本之路及东亚、东南亚地区所走的日本之路的预测，显示了灾难性结局的到来。20 世纪的增长形态是寻求巨大消费和庞大浪费，不惜一切代价地疯狂追求“经济增长”，舍弃农村地区，使人口聚集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不断被侵蚀的特大城市之中。但是这种形态必须在 21 世纪中被克服。

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及其支撑增长的异常能量是 21 世纪的问题之一，而并非解决问题的答案。这种黯淡的观点也许像异端邪说，但是必须被认真对待。现在，缓慢而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为取得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而努力的漫长道路已至尽头。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向人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目标：一方面建立公正与和平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造就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可持续的、共生存的关系。

由于各种交错的原因，先进资本主义的矛盾仿佛给日本带来重于其他国家的负担。也许失败感和危机感越深，最终遇到挑战的可能性也越大。其任务正是构筑一个真正

的 21 世纪的社会。在制作这个建筑图纸时，既没有图案，也没有模型。这里需要的是崭新的远景，而且只有这种远景才会刺激日本人的想象力，使他们创造新的能源和生机。但是这些大问题需要其他书籍去精心论述。如果中国读者积极地评价本书，这便是对我的极大鼓舞，促使我更深远地思考这些问题。

加文·麦考马克 (Gavan McCormack)

日本筑波市，1999 年 2 月

日文版序言

我于 1962 年首次来到日本。当时没有任何人把日本看作经济大国或成功者的榜样。在东京驹场留学生会馆周围的田地中，赤着脚的孩子们拿着竹笼子，追逐着蝴蝶和蜻蜓，知了和青蛙的鸣叫声震耳。有时还能清晰地看到浮现在西边天空中的富士山的轮廓。

那年的夏天，我们留学生旅行团参观了绢丝品、陶器、人工繁殖珍珠等工场，渔村的海产品加工场，神社、寺庙、博物馆及旅游胜地。当然没有人会想到去访问“丰田”或“索尼”公司。

自 1963 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筹备开始，东京各处都挂满着“禁止随地小便”的牌子。东京街道上的新开发建筑成了热潮。新干线和高速公路的建设也完成，开始了“高度经济增长”的奇迹。

从现在看来，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日本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仿佛是“古代”一样。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那个不富裕时期的日本的。

1997 年 1 月初，我去了东京新宿车站的西口和临海副都心看了一眼，觉得“无家可归者”一词同“山珍海味”、“名牌货”一起成了日常用语。“公平”、“正义”之类的词汇已经消失。

尽管身处临海地区，却闻不到海洋的气息。去年首次访问日本的英国友人说，他对被破坏了的日本风景感到失望，对每天电视中报道的贪污、退休的高官在私营公司中得到的厚禄、失职行为的不断出现感到吃惊，但同时，在旅途中又遇到不少有礼节和诚意的日本人，心中产生了复杂的感情。

自我第一次到日本，已过了 35 年。公共厕所变得干净了，人们穿着优质的服装，无论在怎么样偏僻的地方都可以买到难以相信的多种多样的食品。昼夜营业的小型超级市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现在，世界市场上 40% 的海虾、30% 的金枪鱼是进入日本市场的。近年来亚洲诸国的经济也在快速增长，想用海虾和牛排来饱口福的人在急剧增加。

整个世界的供给量是有限的，将来该怎么办？自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首脑会议以来，“环境容量”这一概念逐渐被人熟悉。从地球上公平分配消费的角度来看，日本的能源消费量，二氧化碳、氮气的排放量是允许范围的 10 倍以上。

在日本的国内外，20 世纪末的日本的远景是灰暗的。自埃兹来·沃给氏的《世界第一的日本》出版后不到 20 年中，这个曾因东京不动产价格总额是美国全国土地和建筑物价格的 3 倍而闻名的“日本的世纪”，在未到来之前，已经烟消云散了。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日本是被看作所向无敌的国家，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人们开始担心日本接二连三的失败和贫穷化。有人说，“世界第一的日本”仿佛是一个“空空洞洞的日本”。

在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中，人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

么？现在是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日本“繁荣”模式的魅力在于其不受政治观念束缚，因而受到东亚及东南亚国家的无条件欢迎，并得以推广起来。在日本国内已经超过自然资源可以维持的水平的“繁荣”是否也能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实现呢？

过去的35年究竟应怎样看待？是值得用勤奋和努力换取的东西吗？何谓成功？何谓失败？此书是我尽力回答以上几个疑问的结果。此书已于1996年在纽约和悉尼出版，在东京、汉城和上海的出版将会有怎样的反响是我深感兴趣的。

加文·麦考马克(Gavan McCormack)

澳大利亚堪培拉市，1997年9月9日

英文版序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50 周年的夏季，电台新闻报道了在日本的一个大城市中举行的“向日葵和平运动”。即自 6 月下旬至 7 月的每个星期日在各个地区的小学里，将向日葵的幼苗赠送给市民，到了 8 月 15 日那天，整个城市将开遍茁壮的向日葵，以此来歌颂和平。在广岛，8 月 6 日举办了评选新和平赞歌的国际竞赛。被选上的作品由青年合唱队演唱。与此同时，电视新闻报道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提出的强烈抗议，而世界唯一的原子弹受害国日本却只显出冷漠的态度，新闻记者为之而失望。7 月下旬的参议院竞选中，有几个候选人利用此机会进行反核武器运动，从而出现了新闻记者和政治家号召冷漠的大众参加反核武器示威游行这一奇特的现象。

这一年夏天，日本教职工会改变了其方针，不再反对在学校典礼上升日之丸国旗（日章旗）和唱国歌“君之代”了。不仅如此，工会还决定协助文部省解决目前日本学校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自 1947 年工会成立以来，众所周知的是工会不仅把精力集中在会员的经济福利增长上，而且对日本的再整军备、教科书的检查、“修身”科目的复活、教员勤务效率的评判进行了非战斗性的强烈反对。虽然同文部省作的斗争都失败了，但工会的活动保持了其特性，也使人

们认识到国家的政策给学校课堂带来的明明暗暗的影响。今天当日本教职员工会同长期的冤家对头握手，并发誓要协助其任务时，很难想象日本教职员工会怎样来确立自我存在的理由了。也许没有多少人会对日本教职员工会的窘境感到悲伤，但当教育制度被国家经济需要无情利用的弊病逐渐显露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日本已不存在可以反对此现状的组织和团体了。

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勇敢地发表声明说，在世界大战中日本采用了误国政策，给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但是，一年前村山首相所率领的日本社会党早已放弃了对国家和国策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尽管首相的声明是明显的谢罪，但这样的谢罪从来都是被限制在辞藻上的，因为日本政府并不保证对这个误国政策的受害者给予补偿。海外新闻界的多数人都积极地评价了村山首相的态度。然而当谢罪变成了事务性的工作时，它不仅对于日本的领导阶层，而且对同此事有关的海外人士来说都是一件乏味的东西。尽管如此，人们依然认识到有效的谢罪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在大多数的新闻报道中有一件事实尚未触及到，即在这个重要纪念日，村山首尔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日本国内早已确认了天皇没有战争责任之事。村山首相再次认可了这一战后日本根基中存在着的神话。首相这种不得已的回答反映了战败后50年里日本社会的状况。总之，代表日本国家的村山首相的谢罪和6月国会决议的失败一起造成了一个虎头蛇尾的结局。这个决议本来是对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犯罪行为进行谢罪的，却变成了一个和平宣言，而且其宣言也未得到什么支持。

日本在战后宪法中设立了放弃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

手段的条款,过去 50 年中的和平明显地象征了日本的独特性。“和平与民主主义”曾是一组常用词,而今天伴随“和平”的是“繁荣”。即每年 8 月 15 日在国家主办的战争牺牲者慰灵祭上,建立在国民牺牲之上的“和平与繁荣”这一词开始被使用起来。日本的战败和美国对日本占领期间建立的国家结构及方向性回答了“除了战争和准备战争以外,一个民族国家还能作什么?”这一问题,成为世界史的活生生的教材。

从日本那儿立刻能得到的一个答案是,如果把繁荣作为目标的话,市民是能动员起来的。繁荣被理解为不间断的发展,这个概念已渗透到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借加文·麦考马克先生的大作《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研究》中的简明措辞来说,战后日本用 3C(建设、消费、管理, Construction, Consumption and Control)替代了战争。麦考马克先生使用丰富的资料,通过富有说服力的论述向我们显示了,如果要理解 8 月 15 日的首相声明、向日葵运动、或日本教职员工会的方向转变,必须首先探讨日本战前战后目标的转换。尽管此书中没有具体地讨论这些事项,但书中的分析说明了这些现象的原因,并论证了其分析说明的普遍性。麦考马克先生对现代日本几个侧面的持之以恒的研究使得此书成为一项卓越的成果,使其他战后 50 年来发表的用英语和日语写成的多种相关书籍逊色。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国家”的日本究竟建立了怎样的社会?日本的战后史向世界表明了什么?对这两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一定会热心地阅读完此书的。

本书的记述开始于 1995 年 1 月发生的触目惊心的阪神淡路大地震。日本是以财富和无所不能的智慧而自豪

的。在地震灾难中，其物质及社会资源都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此书中关于地震的探讨明快地引导出“土木建筑国家”，“娱乐国家”，“农业国家”，“地域国家”及“和平国家”等各个章节。“地域国家”一章正面讨论了战争的遗产，阐明了记忆结构中出现的忘却状态。“和平国家”一章论述的内容至少在日本是常常同德国进行比较的。在研究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的英语文献中，麦考马克先生的这一章可以说是最简洁和经过严密考证的论文。作者的视野通过前面各章的现代日本的描述而进一步扩大，使得读者最终明确地认识到大地震的灾难及余波正是现代日本的象征。

尽管有不少严肃思考的或消沉的日本人抱有疑问，感到困惑，或直率地反对，但战后日本仍然是为经济增长而增长的典型社会。即使不是故意的，这样的社会必然导致无视国民的福利，而且根本地阻碍了认真理解和讨论生活条件的可能性。麦考马克先生的 3C 是批判地借用了日本有名的三件一套：即模仿皇室的“三种神器”（八尺镜、草薙剑、八尺琼曲玉）而称呼的 1954 年的“洗衣机、吸尘器、冰箱”，1966 年的“小汽车、空调、彩电”，和 1993 年的新婚太子妃所代表的理想性妻子的条件“职业、等级、聪明”。不管人们是否认真地对待这个模式，麦考马克先生的论著不仅呈现了日本在满足和创造新的欲望上所投入的巨大努力，也分析了其努力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当一个国家的国民长期极度地忙于生产时，并且当娱乐被狂乱地追求时（如“娱乐国家”一章中所指出的，娱乐设施的建设给自然环境带来了灾难），怎能期待这个社会会采取应有的措施来赔偿日本在战争中制造出的外国受害者，如从军慰安妇和被强制劳动的矿山工人呢？

《虚幻的乐园》批评地调查、探讨了现代日本面临着的各种矛盾；但应强调的是此书决不是攻击日本的著作。由于本书对日本的历史及政治经济进行了一丝不苟的考察，使得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日本的各种问题并非来自所谓的“日本独特性”，而是来自具体的政策决定过程和全球规模的压力。正因为战后日本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被视为其他国家的榜样，所以对日本的详尽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日本的矛盾不应说是独特的东西，而是由于其大半的人口都在不惜任何代价地为经济增长而拼命，其矛盾被激化了。这些矛盾也代表了其他发达国家正面临着的，或将要面临的问题。此外，日本成功的大半同榨取世界其他地区有关，这与其说是独特的，不如说是典型性的问题。

如果将此书看作是攻击日本的书，便会犯根本性的错误，因为此书的论据几乎都是来自日本国内的学术著作、新闻报道和政府的刊行物。贯穿在此书中的论点是反对动辄将批评日本作为攻击日本的夸张观点。尽管那种观点明显是单纯和无用的，但常常被一部分对掩盖事实感兴趣的人不坦率地，或被一部分欧洲至上主义者真诚地重复着。麦考马克先生指出，不管其动机如何，那种观点重复地把日本社会简化为只有一种观点，并且否定了日本社会中相当广泛的不同见解。毫无疑问，而且最重要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书像《虚幻的乐园》那样用英语准确地传达了坚韧抵抗“一言堂社会”的日本人的深思熟虑。这些日本人大多是受到尊敬的和比较闻名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背后众多的人们，如长期支持家永三郎反对政府对教科书审查的诉讼案的无名教师们、寻求食品安全运动的主妇们、为外国劳动者及被骗入现代卖淫业的东南亚女性们出诊的医

生们。

对于所有对日本不寻常的经济发展给世界各个方面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及想效仿日本的东南亚各国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不可少的书。此书有无与伦比的丰富资料，充满着大量有关当代日本的解说性统计材料。加文·麦考马克先生清晰和理智的文章有效地描述了日本因疯狂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出现的超现实的几个侧面，如日本列岛发展成“游憩地”，其轮廓被钢筋水泥盖住，很多部分因人工填海而连接，内陆部分被融化在一起。最后，由于作者来自澳大利亚，而不是美国或日本，使其研究在全球形态上同时兼有视野广阔的洞察力和地方观察力之优越性。一些读者也许会对日本企业活动给泰国、菲律宾的环境带来的惨状增加理解。此书也使我们不得不深思澳大利亚为了迎合日本市场的嗜好而改变其畜牧业形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当我们站在冷战结束和 21 世纪到来的交叉口之间，如果我们睁开双眼，对公正、富有人性、易于生活的世界抱有信念，并不断往前走的话，那么《虚幻的乐园》显示了一个富有创见性的调查研究的例子，这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诺尔马·菲尔德

致 谢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通过同不少人的讨论和听取一些人的严格批评,我受到很大启发。拙著及其中的修改也许不能完全满足他们,但是我很感谢他们的耐心、宽容,特别是他们的批评。我也许忘记了一些名字,但至少想向下属的人们表示深挚的谢意:青木秀和、罗尼·亚历山大(Ronni Alexander)、白杰明(Geremie Barme)、米切尔·伯纳德(Mitchell Bernard)、地培希·洽可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希德·克劳卡瓦(Syd Crawcour)、马克·埃尔温(Mark Elvin)、诺尔马·菲尔德(Norma Field)、约翰·芬彻(John Fincher)、乔纳森·哈特(Jonathan Hutt)、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莫里斯·罗(Morris Low)、松泽哲成、彼得·迈耶(Peter Meyer)、宫本宪一、中尾肇、汉克·内尔森(Hank Nelson)、薛而敦(Mark Selden)、赞歧田训、理查德·坦特(Richard Tanter)、常石敬一、内海爱子、和田春树。1994年在访问神户大学研究生院参加国际合作学科研究的3个月中,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在此对研究生院的各位同僚,特别是院长芹田健太郎教授表示谢意。也向每日一起工作,给予我批评和鼓舞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同僚们的友情致谢。地图制作部的伊恩·海沃德(Ian Heyward)绘制了26页的地图。我所在小组的事务员多萝